**台灣大學生民主價值之轉變—三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

**系級：政碩一**

**學號：108252022**

**姓名：李弘文**

**壹、前言**

民主價值如何影響一個政治體系經常是政治學者關心的議題，他們常將一社會的民主價值視為是民主體制是否能穩定甚至是否會達到民主鞏固的前提，例如Almond和Verba就在*The Civic Culture*一書中論述到政治效能感越高的人，認為自己越有能力與機會影響或參與政府的決策，因而對現有之體制（民主體制）會更加滿意與信任(Almond and Verba 1963)。而根據Linz對於一個達民主鞏固的國家之特徵論述，其中便包括了公民在憲政層次認為民主是唯一且最好的遊戲規則(Linz and Stepan 1996)。由此可看出民主價值與該社會是否已經達到民主鞏固階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陳光輝　2010）

「Schumpeter認為民主政治即為透過選票的競爭以取得政治權力的制度性安排」（游清鑫　2015）。雖然一般我們認為「可以有選舉而沒民主，但不可以有民主而沒有選舉」（Bratton 1998；游清鑫　2003；2015）。意味著，民主體制之可貴與真正內涵並不在於「行為」而在於民主之「精神」與「價值」，但投票行為仍是其價值的實踐，因此在反映民主價值的重要性的同時我們也不能輕易將民主價值以及選舉行為脫鉤。

陳光輝在《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該文章之研究指出民主價值與民主轉型經驗之關係不旦非如同過往文獻所認為的呈正向的線性關係，意即這些線索表示民主價值是一社會能否完成民主轉型甚至達到民主鞏固的前提。然而在該文中卻是呈現曲線(curvilinear)之關係，這意味著民主經驗並非使一社會政治態度上升之充分條件。（陳光輝　2010）

以該文章作為基礎，身為一名政治態度形塑於所謂二次翻轉(twoturn over test)後民主鞏固時代的大學生(Huntington 1991)，對於該文中引述的第二筆資料（2001年）將近再10年後之台灣大學生民主價值的傾向存有疑問。若真如陳光輝所述人民的民主價值將因民主經驗高峰退潮後而隨之下降，那麼在距離當時民主化高峰近20年後人們之民主價值將不斷下降更甚於第二筆資料之研究顯示。同樣的預測可以從既有的本土研究中找到基礎，在二次政黨輪替後，台灣民眾並沒有如早期文獻預期的有更高的民主價值，反之僅有半數左右的台灣民眾認為民主體制是絕對並給予信奉與支持。（黃信豪　2011）

此篇文章將以一篇理論檢驗型論文(theory-testing)的角度出發，以進一步的經驗證據檢驗現有之理論(Evera 1997)。並企圖提出不一樣的結果假設，我認為社會之政治態度並不會如《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所言隨著民主轉型關鍵時期之漸遠而出現政治態度逐漸低落，而是呈現一種由高走向低後趨於平緩的曲線也就是說民主世代之政治態度下降實屬因受到民主轉型風潮退潮後的暫時性影響，在其影響過後，社會的民主價值會呈現近於水平的發展。（如圖一所示）

本文將透過橫跨三世代的縱貫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了解台灣大學生之民主價值的演變。以下將從研究的理論基礎開始討論，隨後進行相關文獻之回顧。然後介紹本研究將採用的資料與研究方法。接著依據資料分析後所得結果進行解釋說明。最後將說明本研究所受之限制與其中可能存在的疑點和偏誤。





圖1 預期之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貳、政治社會化**

根據政治社會化研究的重要著作《The Civic Culture》中對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政治文化指的是一個人民對於政治標的物（例如政治社群、典章制度、權威當局、政府的具體政策）的政治活動模式。政治活動模式包括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以及評價(evaluation)。認知取向指的是對於政治社群、典章制度和權威當局的知識、區分和了解；情感取向指的則是對政治標的物投入情緒上重要的依附感或涉入感；最後評價取向係指對政治標的物依照一套標準給予好或壞的評估(Almond and Verba 1963)。從上述的概念可以引申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定義「一個人在政治上的行為定向及行為模式，常常是通過實際的生活經驗及有形的學習方式而形成的。此種形成的過程即為政治社會化」（易君博　1990）。簡言之，「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是個人獲取政治定向以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Easton and Dennis 1969)。

**一、年紀與關鍵年代**

「心理學在研究人格成長的問題時，曾發現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那就是一個人孩童時期的生活經驗及學習過程決定了它的人格之形成。」（易君博　1990 轉自Irvin 1954）。學者針對孩童的研究中提出首要原則(primacy principle)和結構原則(structuring principle)兩個原則，前者指的是「孩童時期的學習將會在整個生涯中有著相對持久的影響」；後者則是指「孩童時期所得的定向會具體地建構之後學習之相關議題」(Searing et al. 1973) 。由於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奠基於這樣的心理學教條之下，學者們普遍相信兒童時期受到的教訓會塑造一個人未來的態度和行為，也因此早期的社會化研究著重於國小孩童(Andolina et al. 2003 轉自Easton and Dennis 1969)。之後由於政治社會化相關子領域的成熟，學者們重新修改了他們對此的框架以解決穩定性和變化的問題(Andolina et al. 2003)。並且將研究重點從國小幼童轉移到Mannheim所謂的關鍵年代(impressionable years)。這樣的時期學界普遍定義為從青春期後期到成年初期的區間，若更精確的估算則為18歲到25歲的時候，在此年紀範圍內個人所養成的政治習慣將會持續影響一生。換言之，18到25歲便是一個人一生中政治態度形塑的主要時期（Andolina et al. 2003；陳陸輝　2016）。而此一時期正好與台灣學制的大學時期有所重疊，且於此時期所形成的人格愈趨成熟，政治的態度與行為傾向也接近穩定。因此針對大學生的政治態度研究幾乎可以做為預測未來態度的指標（鄭宏文　2011），故將台灣的大學生設定為本文將研究之對象。

**二、政治社會化的媒介**

政治社會化的媒介(agent)主要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傳播媒體與政治事件，以上的媒介都會對個人的政治態度形塑產生影響（陳陸輝　2015；陳陸輝　2016；劉嘉薇　2017）。其中在大學生的生命歷程中，又以家庭、學校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為最主要接觸的媒介（鄭宏文 2011)。

家庭為大多數人最早接觸到的政治社會化媒介，雖然有學者指出家庭對於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形塑影響並未如一般預期的如此之高(Verba et al. 2006 轉自Jennings and Niemi 1981)。但不可否認的是，家庭為孩童提供了個人出身與成長的環境，同時也定位了一個人所處的社經地位階級（劉嘉薇　2017）。根據學者研究顯示，相較於社會經濟地位偏低的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由於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雄厚，因而能夠提供給子代更優異的教育資源。此研究也發現這些優勢家庭的父母更經常的在家中有討論政治議題的情況，並且能提供且鼓勵子女進行政治參與，因此這樣的優勢家庭能更高程度的將親代的政治態度轉化給子代。換言之，來自優勢家庭的子女會很高比例的與其父母有著雷同的政治態度(Verba et al. 2006)。由此可知，若個人透過家庭所得到的政治相關訊息非常多，那麼可能會對個人未來的政治行為與政治定向有著深遠的影響（鄭宏文　2011）。而一名孩童能在家庭此一媒介中獲取多少政治訊息則主要取決於親代與子代之間的互動，倘若有越高的互動頻率，例如政治討論、自由發表意見、參與政治活動等，便有越高的可能性產生「政治態度複製」的情形。

年紀到達學齡的孩童因我國國民義務教育之需求除相對少數在家自學的案例外，都會進入學校學習。在學校中，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可以透過正式的課程設計又或者非正式的政治氛圍、社團活動、政治參與、人際互動等產生形塑的效果。（陳陸輝　2015；鄭宏文　2011）。前者指的是國家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將有關政治制度運作的知識、價值以及規範設計成學校中的課程，在台灣通常為公民教育相關科目，並灌輸給學生；後者則是指社團活動、學生自治組織、公民參與、開放討論與志工服務等（Andolina et al. 2003；陳陸輝　2015)。其中，學校透過給予自由討論的空間與公共事務參與的機會訓練學生的公民技巧（例如辯駁、演說、連署等），而研究顯示具有這些公民技巧的學生會比沒有的人有更高比例願意參與公共事務(Andolina et al. 2003)。有部分研究將這種學校提供的政治社會化環境稱之為「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特別強調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課堂上的討論，並認為這樣的氛圍是造成學校對個人價值與態度形塑的主要原因。（鄭宏文　2011 轉自陳陸輝、黃信豪　2007）

上述提到之家庭與學校對個人價值形塑的功能一般較普遍為學界所接受，討論之要點停留於影響程度的問題。然而相較之下，大眾傳播媒體是否具有影響力是更具有兩面性的討論。McCombs與Shaw的研究指出大眾傳播媒體對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影響效果僅限於強化一個人既有的政治立場，這是因爲其主要功能為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也就是說透過頻繁出現某些新聞訊息使民眾認為這些議題是重要的（McCombs and Shaw 1972；陳陸輝　2015）。此外Dawson和Prewitt(1977)也提出了幾乎類似的觀點，主張傳播媒體只是在增強既有的政治態度，而非改變政治態度。但持相反意見的學者卻認為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不僅止於強化既有價值與態度，而是的確能造成價值的改變（陳文俊　1997 轉自鄭宏文　2011），相似的結果也在國外「電視新聞」的實驗設計中得到驗證，認為新聞的議題設定能力的確會變更民眾對總統評估時的指標(Iyengar, Peters and Kinder 1993)。

由於民主價值為一種政治態度，學者認為民眾的民主價值態度變遷，具有世代差異、生命週期與制度學習三種理論，但綜觀以上相關政治社會化之研究，無論何種理論都無法單獨解釋個人政治價值之形塑，事實上應該是同時發揮效果的，因此本文將立基於個人的價值與態度會持續變動的理論，也就是在Jennings與Niemi(1991)四種分類中的終生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參、民主價值**

延續上述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的定義。「假使我們同意Almond與Verba對政治文化的界定，那麼民眾的民主相關態度，或許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一國民眾所彰顯對民主的認知、情感與評價之集體特質」（黃信豪　2011）。此外，「一國之中，人民所具有之民主價值取向對於民主化的重要性，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肯定，因此，民主的政治文化，有利於民主化的形成」（鄭宏文　2011）。所謂民主化又稱為民主轉型，根據Robert Dahl對於民主政體(多元政體)的描述，他認為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擁有以下基本條件: (1)保障言論自由；(2)保障新聞自由；(3)保障集會結社的自由；(4)主要的政治決策者須為民選產生；(5)選舉過程自由且公平；(6)普遍的選舉權；(7)普遍的被選舉權（郭承天　2015；蘇子喬　2017）。更詳細之民主程度的判准則可見於1972年開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進行的相關評鑑，但大抵不脫Dahl的原則（盛杏湲　2015）。亦有學者將民主體制與政治態度結合，稱此為「民主價值」，而其意涵便是指稱一個民主政體下體系成員在角色權力的規範上所持有的信念。（胡佛　1998）

**一、台灣的民主歷程**

台灣普遍被視為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成功的典範（陳光輝　2010）。就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來看，1949年因中國國民黨於國共內戰中失利撤退來台，同年蔣中正頒布《戒嚴令》開始長達38年的威權統治。1986年原黨外勢力透過組織籌組民主進步黨成為除國民黨外另一政黨，此一舉更奠定了未來1990年代開始藍綠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版圖。隔年蔣經國宣布「解嚴」與「開放黨禁」，中華民國正式從威權時代解放，進入「政治民主」時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於1996年施行了首次人民直選總統，並選出李登輝為首任民選總統，這不但顯示出了總統的正當性也更加得符合民意。2000年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當選，此次選舉象徵著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地由國民黨轉移到民進黨，期間並未發生任何政治暴力或動亂。更於2008年由國民黨再次贏得總統大選，獲得執政權出現了二次政黨輪替。（王靖興、孫天龍　2005；陳陸輝　2016；黃信豪　2011）

根據Huntington(1991)提出的「二次翻轉檢驗」(twoturn over test)的主張，其中認為當一國可以經歷兩次政黨輪替的檢驗後，便意味著該國正式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因為這代表該國政治菁英普遍可以接受以民主選舉作為權力更替、解決爭端的機制，亦可透過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權的轉移。而國內相關研究，如依《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中顯示透過2008年TEDS的研究調查，「若以Diamond所提倡民主鞏固的判斷指標來看，在歷經二次政黨輪替後，台灣民眾對民主機制的支持程度免強達到民主鞏固的標準。」（黃信豪　2011)

關於民主鞏固的定義Linz與Stepan(1996)將之分為三個層次進行說明，在憲政層次中指出達民主鞏固國家中的民眾會將民主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在行為層次中則認為達民主鞏固的國家民眾不會採用激烈的手段推翻民主，換言之，他們會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爭端的解決；最後從態度層次出發，達民主鞏固的國家民眾會相信民主體制即便不是完美的，但仍是所有政體中最佳的選擇。對於相關議題所提出的標準還有Diamond的主張，他認為「民主鞏固的標準包含菁英、政府組織與大眾三者。在大眾的面向上，他認為應要有超過70%的民眾對民主制度有所偏好，並且相信民主是該國最適合的政治體制。而相對地，偏好威權體制的民眾應該低於15%，這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民眾絕大多數都穩定地認可民主的遊戲規則與機制。」（黃信豪　2011）

根據上述對於台灣民主化歷程與民主鞏固的相關說明，我們可以對此進行概念的延伸。學者認為「民眾的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感皆能提升台灣民眾的民主評價」（王靖興、孫天龍　2005）。換言之，「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支持與正面評價，是一國民主政治機制得以維繫的重要條件」（黃信豪　2011）。因此可以發現，若我們要對民主相關議題進行研究，那麼如何測量民主價值的課題便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中的角色。

**二、民主價值的指標**

陳光輝（2010） 指出民主價值本身同時是由多個指標所構成的，因此無法以單一的指標進行測量，在該研究中將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政治平等、政治容忍、政黨競爭等民主價值的指標納入測量，共12道題目。然而，本文受限於歷次調查中問卷並未一致的原因，再經由共有之題目中挑選後，針對「民主體制」、「政治容忍」、「自由權」、「服從權威」與「制衡機制」進行測量，詳細題目內容將於後文說明。

**肆、政治世代**

**一、政治世代**

所謂「世代」(generation)的概念可以視為生物學或社會學上的概念。在生物學上，世代僅是因為出生於同一個時期而被歸類於同一出生世代(birth cohort)；相比之下社會學上的世代有著更加複雜的意涵，再這方面，學者一般認為同一世代因為身處於類似的背景因而有著類同的經歷，更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了同類型的價值。國內關於政治世代的研究非常多，例如陳陸輝（2000）透過研究1992年、1995年、1998年三個世代得世代的不同會使政黨的認同有顯著的差異；盛杏湲（2002）認為政治世代的不同會影響個人之統獨立場；王靖興、孫天龍（2005）更總合以往的研究認為世代差異會導致不同的民主價值。

由於政治世代一向被認為是影響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且社會價值是不斷持續變動得，因此辨別不同世代的價值與個別特色顯得相當重要，可以用以作為現今研究的基礎又或者成為預測未來趨勢走向的依據（Neundnorf and Richard 2014；王靖興、孫天龍　2005；盛杏湲　2002；陳光輝　2010；陳陸輝　2000）。

**二、年齡—時期—世代分析**

然而針對不同世代的研究必然呈現跨時研究的型態，則往往會同時受到年齡效應(age effect)、時期效應(period effect)和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的影響，因此世代研究便會涉及「年齡—時期—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的問題。

年齡效應指的是伴隨人的年齡增長，會形成類似於成熟效應(mature effect)的機制，在實證研究中認為不同年齡的人會立基於不同的思考點而呈現出不同的政治觀(political outlook)，並基於生物歷程(biological processes)或生命週期(life-cycle)的變化伴隨著社會經驗的累積而形塑出不同的社會角色與態度，如隨年紀增長會越趨保守；時期效應則指態度也會受到當前大環境脈絡下具有特色的政治、經濟或社會事件而影響著身處於該時期的每一個人，而這樣的影響是跨年齡層亦跨世代的，例如革命、經濟蕭條；最後世代效應則是說人的政治態度也可能因為不同的社會化經驗，而形成自己的一個次級團體(subgroup)，而這樣的社會化經驗則是來自於這樣的一群人在成長過程中共同經驗的關鍵事件（Neundnorf and Richard 2014；黃紀　2016）。

基於Neundnorf與Richard (2014)的研究中認為上述三個效果對於個人的價值形塑是相當難獨立分割的，然而在文中也提出了可能的解決方法，那就是將三者中其中之一移除。因此本文將研究對象的年齡侷限為大學生，由於三個研究的世代皆處於大學階段，藉此我們可以盡可能的避免成熟效果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

**三、1991年、2001年與2015年三個世代**

如同前段所述，因為社會不斷經歷的變動，使得不同時間點上的民眾會有著迥異的政治經驗，塑造出擁有不同民主價值的政治世代。因此，本文將基礎建立於政治世代的概念上來觀看三個世代大學生的民主價值轉變，是否如前言末段所預測的走向發展。本文比較的分別是1991年、2001年與2015年三個世代，以下將以「轉型世代」、「民主世代」與「鞏固世代」對之進行稱呼，對應的則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轉變。

大多數轉型世代的大學生出生於1967年至1972年間，約於1980年代進入政治態度與價值型塑的黃金時期，於此段時間正好經歷台灣由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的階段。而相較於此，民主世代的大學生則約莫於1990年代進入青年時期(young adulthood)，對比威權世代的最大差異在於，這些大學生一出生接觸的便是民主體制與瀰漫著民主氛圍的社會。最後，結合民主鞏固的概念，鞏固世代的大學生約於2000年代由青春期轉入青年期，時值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後，若說民主世代位於台灣民主化歷程中從民主化邁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那麼鞏固世代正值民主體制與社會民主價值經歷更長久穩定發展的正式鞏固階段。（陳光輝　2010）

若說轉型世代的大學生經歷了威權進入民主的歷史劇變，為民主轉型動態過程中的抉擇階段(decision phase)，相比之下，民主世代的價值形塑關鍵期則處於民主轉型的適應期(habituation phase)，那麼在相對更民主的時空脈絡之下的鞏固世代可以預期應該已完成了適應的階段（Rustow 1999；陳光輝　2010），本文將探討此三世代在民主價值上的轉變，並假設三個世代在民主價值上有所差別，且如前言中所預期的發展。

**伍、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將使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義彥教授主持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政治價值和態度之變遷」（登錄號：D00028）、「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政治價值和態度之變遷」（登錄號：D00080）以及國立政治大學陳陸輝教授進行的長期定群追蹤計畫—「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Ⅳ）」（登錄號：E10053\_4）進行資料比較與分析。

問卷調查對象為：前兩者係從台灣地區四年制日間部大學生，除去軍警學校後，依公、私立、一般大學或技職大學分為七層執行分層抽樣分，並進行三階段（第一階段抽出學校，第二階段抽出科系，第三階段抽出受訪學生）的隨機機率抽樣。後者則是於2011年將我國約148所四年制大專院校（除去軍警學校）後，以各校為分層單位，分為公立一般大學、私立一般大學、公立技職大學、私立技職大學與師範院校五類，接著以各校為第一抽出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PSU)，接著對這些學校的大一新生依機率等比例原則進行隨機抽樣。

因前兩次調查抽樣母體為全體大學生，然而第三次調查為追蹤調查之大四大學生，為進行比較因此將前兩次調查資料取出大四學生之樣本進行分析。樣本數分別為319份有效樣本（1991年）、374份有效樣本（2001年)與1094份有效樣本（2015年）。資料蒐集則以面對面訪問方式，分別調查於1991年3月9日至3月29日、2001年4月1日至5月31日、2015年3月至同年6月。

**二、分析方法**

由於受到三次調查中原始問卷題目一致性的限制，本文由1991年、2001年與2015年三筆資料中僅選出「民主體制」、「政治容忍」、「自由權」、「服從權威」、「制衡機制」5題與民主價值概念相關之題目進行介紹與整理，每道題目皆為一個與民主價值概念相關之正面或反面陳述。

此外受制於前兩筆資料之各題選項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等六分類選項，第三次調查時調整為四分類，因此本文將各變數重新編碼為是否同意民主之二分類，再將反面陳述的題項轉向重新過錄，使其與正面陳述之題目方向一致，僅考量民主價值態度之方向，而捨棄程度之差異。

首先會先將五道題目之敘述以及同意與否之次數分配表呈現於表一。再以折線圖(圖一)的方式呈現5題題目在分別測量三個世代時的變化狀況，在此部分本文會將原始資料中的多類別資料轉換成二分類的同意與不同意之類別資料，顯示每個世代大學生在各項民主價值呈現傾向民主者的百分比。

走向，本研究使用的題目如下：

表一 民主價值各面向的變化

**民主體制**

**・我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體**

**・有人說：「民主雖然有問題，但是它仍是最好的政府體制」請問您同不同意這**

**種看法？**

**・有人說：「民主雖然有問題，但是它仍是最好的政府體制」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看法？**

|  | 轉型世代 | 民主世代 | 鞏固世代 |
| --- | --- | --- | --- |
| 同意 | 308  (96.6%) | 330  (88.2%) | 906  (82.8%) |
| 不同意 | 10  (3.1%) | 44  (11.8%) | 187  (17.1%) |
| 無反應 | 1  (0.3%) | 0  (0.0%) | 1  (0.1%) |
| 合計 | 319  (100.0%) | 374  (100.0%) | 1094  (100.0%) |

**政治容忍**

**・意見不同的少數人也應有自由表達的機會**

**・意見不同的少數人也應有自由表達的機會**

**・意見不同的少數人也應有自由表達的機會**

|  | 轉型世代 | 民主世代 | 鞏固世代 |
| --- | --- | --- | --- |
| 同意 | 311  (97.5%) | 360  (96.6%) | 1055  (96.4%) |
| 不同意 | 6  (1.9%) | 14  (3.7%) | 39  (3.6%) |
| 無反應 | 2  (0.6%) | 0  (0.0%) | 1  (0.1%) |
| 合計 | 319  (100.0%) | 374  (100.0%) | 1094  (100.0%) |

**自由權**

**・政府無權限制人民閱讀他所想要看的政治性刊物**

**・社會上如果只有一種意見與聲音，社會就不會進步**

**・社會上如果只有一種意見與聲音，社會就不會進步**

|  | 轉型世代 | 民主世代 | 鞏固世代 |
| --- | --- | --- | --- |
| 同意 | 288  (90.3%) | 354  (94.7%) | 1009  (92.2%) |
| 不同意 | 29  (9.1%) | 20  (5.3%) | 86  (7.8%) |
| 無反應 | 2  (0.6%) | 0  (0.0%) | 0  (0.0%) |
| 合計 | 319  (100.0%) | 374  (100.0%) | 1094  (100.0%) |

**服從權威**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長，國事宜聽從他的決定**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長，國事宜聽從他的決定**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長，國事宜聽從他的決定**

|  | 轉型世代 | 民主世代 | 鞏固世代 |
| --- | --- | --- | --- |
| 同意 | 56  (17.6%) | 65  (17.4%) | 181  (16.5%%) |
| 不同意 | 262  (82.1%) | 309  (82.6%) | 913  (83.5%) |
| 無反應 | 1  (0.3%) | 0  (0.0%) | 0  (0.0%) |
| 合計 | 319  (100.0%) | 374  (100.0%) | 1094  (100.0%) |

**制衡機制**

**・為了監督政府，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在野黨**

**・執政黨如果沒有反對黨的強力監督，就會為所欲為**

**・執政黨如果沒有反對黨的強力監督，就會為所欲為**

|  | 轉型世代 | 民主世代 | 鞏固世代 |
| --- | --- | --- | --- |
| 同意 | 290  (90.9%) | 289  (77.3%) | 981  (89.6%) |
| 不同意 | 28  (8.8%) | 85  (22.7%) | 113  (10.4%) |
| 無反應 | 1  (0.3%) | 0  (0.0%) | 0  (0.0%) |
| 合計 | 319  (100.0%) | 374  (100.0%) | 1094  (100.0%) |

(1991 : N=319；2001 : N=374；2015 : N=1094)

圖二 民主價值：世代間的差異

由圖二可知在六個變數中，有三個變數呈現相同的趨勢，「制衡機制」與「服從權威」呈現反向趨勢，也就是說鞏固世代的大學生在此二變數上民主傾向比率高於民主世代大學生的比率。就此而言，隨著民主化發展的進程，更年輕的世代並未因為民主經驗的累積而反映出較高程度的民主價值。

接著，為進一步檢視不同世代對民主價值之影響，將上步驟中傾向民主者給予1分；不傾向民主者給予0分，再將各筆資料加總成介於0到5之間的有序多分類變數呈現民主價值之分數，然因部分類別中個案數過少，故將之重新編碼為民主價值「程度低」、「程度中」與「程度高」的有序三類別變數進行回歸分析，並納入陳光輝(2010)一文中性別、社會化變數、政黨傾向等數個對民主價值存有顯著影響之解釋變數，將除政治世代之外的其他變數設定介於0至1之間，其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 民主價值程度之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模型

|  |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模型 |
| --- | --- |
| 程度低 | 民主價值程度 |
| 解釋變數 | b S.E. |
| **政治世代(對照：轉型世代)**  民主世代  鞏固世代  **性別**  男性  **社會化變數**  家庭決策參與  家長公共事務參與  同儕團體  **政黨傾向(對照：國民黨)**  民進黨  中立  截距 | -.790 \* .345  -.488 .317  -.344 \* .166  .111 .184  .038 .175  .481 \*\* .182  .400 .248  .350 .214  2.27 .386 |
| 程度中 | 民主價值程度 |
| 解釋變數 | b S.E. |
| **政治世代(對照：轉型世代)**  民主世代  鞏固世代  **性別**  男性  **社會化變數**  家庭決策參與  家長公共事務參與  同儕團體  **政黨傾向(對照：國民黨)**  民進黨  中立  截距 | -.605 \*\* .185  -.261 .163  -.192 .103  .029 .118  .141 .109  .255 \* .108  .463 .158  .240 .139  0.378 .216 |
| Pseudo | 0.014 |
| 樣本數 | 1635 |

資料來源：陳義彥、洪永泰、盛杏湲(1991)、陳義彥(2001)、陳陸輝(2015)

說明：1. 左欄為回歸係數，右欄為標準誤

2. \*\*\* *p*<.001；\*\* *p*<.01；\* *p*<.05

在本文最關心的世代差異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對於轉型世代大學生，民主世代大學生中有高程度民主價值的學生機率出現顯著的減少，同樣的趨勢亦出現於鞏固世代大學生上，只是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在性別面來看，相較於女性大學生，男性大學生具有低程度民主價值的機率增加，且達顯著。在過往研究中具有顯著影響的政黨認同變數在此模型中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在社會化機制的部分，家庭的部分並未出現顯著的影響；然而同儕團體確實對大學生的民主價值程度產生影響，相對於不會從同學或朋友談話中獲取政治資訊的大學生，會從對話中獲取政治資訊的大學生屬於低民主價值程度的機率減少，反之屬於高民主價值程度者增加，且皆達顯著水準。

最後回到民主進程的發展與大學生之民主價值關係的趨勢發展，綜觀上述研究發現可知，伴隨著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台灣大學生的確並未如西方的經驗一般形塑出較高的民主價值，透過各世代擁有高程度民主價值學生比例我們可以約略勾勒出大致的台灣大學生民主發展情況，如圖三所示(由於威權世代在本文並未實際測量，因此依據既有學界研究進行畫製，並以虛線表示)，基本上與本文預期假設大抵相符。轉型世代進入民主世代的民主價值下降應為轉型世代有過高民主價值而做出的下修現象，然而鞏固世代與轉型世代相比，不但並未因民主經驗的累積而有更高的民主價值，還稍略低於鞏固世代，成長於民主轉型後的年輕世代有著較低程度的民主價值係屬應當留意的現象。

圖三 台灣大學生民主價值發展趨勢圖

資料來源 : 作者自繪。

**陸、民主價值趨勢之解釋**

政治理論對「民主」最基本的定義，是政府主要的政策決定者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而這樣的選舉必須是公開、公平且有意義的競爭。在此定義下，執政黨就是經由此競爭後所產生的，因此民主政治本身包含著政黨輪替的精神。在歷經長時間發展，民主已達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政黨輪替已然成為常態。回到台灣本土，在2000年與2008年分別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因而被普遍認為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盛杏湲 2002；羅致政、吳釗燮、劉世忠 2011) 。因此根據過往國外民主化的發展來看，民主化的經驗應該會對民主價值產生正面的影響(陳光輝 2010)。然而，根據上章節分析結果顯示，除從威權世代到轉型世代的過程中台灣大學生的民主價值有明顯提升之外，無論是從轉型世代邁向民主世代，又或者更進一步的由民主世代進入鞏固世代，不但沒有如外國文獻顯示的持續上升，反而還出現顯著的跌落情況。此章節將分為兩段落進行討論。首先，會說明為什麼世代之間的民主價值會出現差異，再來，說明為什麼會呈現下降的趨勢。

**一、解釋世代間民主價值存在差異的原因**

《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一文中從三個變數來討論此問題，分別是人口變數、社會化因素與政治上的分歧。在人口變數上，作者認為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因性別意識的抬頭，性別理應不再是影響民主價值變化的主因(陳光輝 2010)。接著討論社會化的因素，其中指出進行測量的受訪者皆為大學生，從前段落中鞏固世代大一和大四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大四的學生相較於大一有較高的民主價值平均數，在過往文獻中顯示受到大學教育與同儕團體的影響之下對民主價值會有正面的影響(盛治仁 2003)。最後，討論政治上分歧的變數，該文納入了省籍背景、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政黨偏好為虛擬變數，而隨後依其研究發現，僅有政黨偏好存在顯著影響。因而，將產生變化的主因導向另外的面向—政治情境。他認為導致轉型世代與民主世代出現民主價值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轉型世代經歷了由威權走向民主的經驗，且測量時正處於民主化之高峰，加上學運營造出人人關心時事的社會氛圍，使之顯示出較高的民主價值；相較之下，民主世代的大學生一出生便身處民主情境，因而不會有過多的態度形塑。(陳光輝 2010)

**二、解釋民主為何呈現如此發展趨勢**

延續上段落的討論，筆者認為台灣大學生的民主價值會呈現如此趨勢，有幾種可能的解釋。

其一為上段落所提到的政治世代差異的解釋，正因民主化高峰已過，因此未接觸到此時期影響的後續世代如民主世代與鞏固世代，出現了民主價值相對下降的趨勢，轉型世代相比其他世代有著較高的民主價值實屬因受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也就是這樣的影響僅歸於該世代所屬的經驗與社會氛圍所致。(陳光輝 2010)

其二為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解釋，因為轉型世代時的各項民主化訴求如廢除國民大會並重新改選、廢除臨時條款等皆已達成，因此民眾關注焦點轉移到新的民主議題上，最直接反映的便是政府的施政表現，而台灣被認為有問題的政府管理能力(governability)，便造成了大學生民主價值下降的情形。除此之外，在探討政治社會化媒介的研究中也顯示，過往由黨政軍掌控的新聞媒體，新聞與資訊趨於單一化，但在民主世代與鞏固世代的社會脈絡下，不再由黨政軍握有議題設定的權力，因而資訊大量出現，政治上的聲音也由一元走向多元，加上新聞充斥許多負面的政治議題，因而造成民主價值的低落。(陳光輝 2010；Norris 2011；鄭宏文 2011；蘇子喬 2017)

最後是經濟發展的解釋，將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上三個世代的經濟成長率整理成表三，可以發現轉型世代相比另外兩個世代有著較高的經濟成長率，若將經濟成長率作為經濟發展好壞的指標之一來看，轉型世代的確有著較好的經濟發展狀況，而另外兩個世代因民主化後經濟發展漸趨遲緩，也連帶影響了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任，進而有著相較之下較低的民主價值。

表三 三個世代各季經濟成長率

|  | 第一季 | 第二季 | 第三季 | 第四季 |
| --- | --- | --- | --- | --- |
| 轉型世代 | 7.02% | 8.64% | 9.21% | 8.53% |
| 民主世代 | 1.45% | -2.55% | -4.06% | -0.3% |
| 鞏固世代 | 4.08% | 1.89% | -0.28% | -0.2%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網 (https://www.stat.gov.tw/point.asp?index=1)

**柒、結論與討論**

本文經由比較三個世代台灣大學生的民主價值來建立台灣民主價值發展可能之模型。受限於部分資料限制，例如樣本全數來自於大學四年級之學生，因此在代表性上或許存在疑慮，但既有文獻顯示受過大學教育者應該有著更高的民主價值。另外，由於民主價值為多元且複雜的概念，因此在透過跨時性研究時很難呈現出民眾在不同面向上的趨勢，根據部分研究指出民眾在民主價值不同面向上所呈現的結果是有所差異的，而這也是本文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固然有上述可能問題的存在，但大抵上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大學生民主價值的發展呈現了上升後又下降的態勢，這與既有文獻指出民主發展應有助於民眾民主價值養成是有所相悖的。反之，如陳光輝(2010)於《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中所指出的相似，民主價值在過了民主化高峰後的確開始出現下降。該文中進步指出這是因為轉型世代經歷了民主化的高峰，當這些大學生實際親身參與了民主化的過程，便從中學習到了民主的運作與規範，因而形塑出較高的民主價值。

然而，倘若真如陳光輝所言，那麼似乎民主價值出現下降的走勢，係因之前的世代有著過高的民主價值，那麼後續世代出現下降也於情理之中，那麼我們便沒有對此有太多擔憂的必要。但位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前端的台灣，回首觀看過去其他次民主化浪潮。分別於1922年與1960年代在民主化後出現了回溯的逆民主化浪潮(reverse wave)，這意味著國家經民主轉型成為民主體制後，事實存在著民主體制崩毀的可能性。再將焦點轉回第三波民主化的亞洲新興國家，雖到目前為止，僅有少數國家放棄了民主政體，但其餘多數陷入了民主停滯的泥濘，前景也不為樂觀。學者認為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新加玻、委內瑞拉等國從未真正從事政治自由化的改革，雖有舉行選舉但實際卻是一種「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這也代表這些國家僅能稱的上是半個民主國家，因而隨時有重回獨裁體制的危機；另外原因，有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施行民主後，出現了司法不公、施政無效率、官員腐化等弊端，而這樣施行民主後的種種問題也會侵蝕著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與信心。(蘇子喬 2017)

最後，再將目光放到國際層次上。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由政治素人擔任地方首長甚至國家元首，例如美國的川普總統、冰島的古德尼‧約翰尼森總統又或者是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長。再加上，英國退出歐盟、義大利重新由極右派政黨掌控政權等等新聞。作者認為這反映了世界上一種「反建制」潮流的興起。人們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開始質疑過往一般掌握政治核心的政治菁英們，並且進一步推翻他們所做出的決策。如果真的如上述所預期，那麼由這些傳統政治菁英建立的自由民主體系將會逐漸斑白失去光彩，最後如同古老城牆般崩毀、倒塌。

目前台灣民主化的施行歷時相比多數西方國家尚嫌稍短，僅因經歷兩次政權的和平轉移便認定達到民主鞏固我認為似乎有些過早。假若台灣民主價值持續跌落，將會對整體民主體制的維持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在未來更進一步的持續觀察，並且確保位於民主大浪前端的台灣民主不會觸及暗礁便如浪花般消逝。

**參考書目**

Ⅰ.中文部分

王靖興、孫天龍，2005，〈臺灣民眾民主政治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2(3)：55-80。

易君博，1990，《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 : 三民。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研究(一)方法與理論》，台北 : 三民。

盛杏湲，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零年代的分析〉，

《選舉研究》，9(1)：41-80。

------，2015，〈民主政治〉，收於陳義彥編，《政治學》，台北 : 五南：130-148。

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選舉研究》，10(1)：115-169。

郭承天，2015，〈政治民主化〉，收於陳義彥編，《政治學》，台北 : 五南：149-166。

陳彥義、洪永泰、盛杏湲，199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

治價值的態度之變遷》(NSC 80-0301-H004-18)。台北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的態度之

變遷》(NSC 89-2414-H-004-048)。台北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臺灣民主季刊》，7(4)：1-45。

陳陸輝，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卷：39-52。

------ ，2015，〈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收於陳義彥編，《政治學》，台北 : 五南：361-382。

------ ，2016，《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Ⅳ)》(MOST 100-2628-H-004-084-MY4)。台北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游清鑫，2003，〈選舉機制與民主化〉，收於楊日青編，《兩岸立法制度與立法運作》，台北 : 韋伯文化：231-359。

------ ，2015，〈選舉、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收於陳義彥編，《政治學》，台北 : 五南：413-443。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18(1)：1-34。

黃紀，2016，〈調查研究設計〉，收於陳陸輝編，《民意調查研究》，台北 : 五南：31-58。

鄭宏文，2011，〈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以我國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

為例〉，《復興崗學報》，101：67-96。

劉嘉薇，2017，〈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傳播〉，收於王業立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台北 : 雙葉：436-463。

羅致政、吳釗燮、劉世忠，2011。《台灣民主鞏固—政權輪替的國家安全與挑戰》，台北 : 新台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

蘇子喬，2017，〈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收於王業立編，《政治學與臺灣政治》，台北 : 雙葉：166-202。

中華民國統計網，1991，〈經濟成長率〉，最新指標：https://www.stat.gov.tw/point.asp?index=1，檢索日期：2020年6月16。

Ⅱ.英文部分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i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onlina, Molly, Krista Jenkins, Cliff Zukin,and Scott Keeter. 2003.“Habits from

Home,Lessons from School: Influences on Youth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6(2):275-280.

Bratton, Michael. 1998. “Second Election in Africa.”*Journal of Democracy*, 9(3): 51-66.

Donald, D. Searing, Joel J. Schwartz, and Alden E. Lind. 2018. “The Structuring

Principle: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Belief Syste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2): 415-432.

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1965.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McGraw Hill,47-70

Huntington, Samuel P.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 ,*17(3): 386-430.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niversity.

Iyengar, Shanto, Mark Peters, and Donald R.Kinder. 1993.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s of the “Not-So-Minimal”Consequences of Television News Programs.”In Donald Kiner and Thomas R.Palfrey.eds. *Experiment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313-331.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1.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cCombs.M.C, and Shaw.D. 1972. “The agenda 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776-783.

Niemi, Richard G., and M. Kent Jennings. 1991. “Issues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orma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971-988.

Neundnorf, Anja, and Richard G.Niemi. 2014. “Beyo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Approaches to Age,Period, Chorts Analysis.”*Electoral Studies*, 33, 1-6.

Rustow, Dankwart S. 1999.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 Van Evera. 1997.*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41.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Nancy Burns. “Family Tie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95-114.